

隐蔽战线五次助党中央脱险



钱壮飞



熊向晖



刘光国

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，我们战胜国民党主要靠两个战场，一个是公开战场，一个是隐蔽战场。近年来，不少隐蔽战线的亲历者及其后人开始撰写回忆录。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可以看到，在党的历史上隐蔽战线曾五次帮助党中央脱离险境。

及时传递叛变情报

隐蔽战线上，“龙潭三杰”（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）可谓战功赫赫。

1929年，钱壮飞受周恩来领导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派遣，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，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，同时担任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江通讯社、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。

1930年12月到1931年5月，钱壮飞将从徐恩曾处获取的敌人发动第一次、第二次军事“围剿”的命令、兵力部署等绝密情报，交李克农转送陈赓和周恩来，确保了红军粉碎蒋介石对根据地的“围剿”。1931年4月24日，顾顺章被捕叛变。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等人次日给徐恩曾、陈立夫发电报。这天是星期六，值班的钱壮飞收到6封特急绝密电报后迅速破译。第一封电报是：“黎明（顾顺章化名）被捕，并已自首，如能迅速解至南京，三天之内可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。”钱壮飞连夜派女婿刘杞夫（中共地下党员）赴上海找到李克农，继而找到陈赓、周恩来，抢在敌人动手前，斩断了顾顺章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，确保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。

破除“铁桶计划”威胁

1934年10月初，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，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“铁桶围剿”计划。

莫雄是国民党老将，在上海担任税警团团长时思想日趋进步。1934年，莫雄出任江西省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，聘请在上海共过事的刘哑佛、卢志英、项与年等共产党人到德安行政督察专署分任主任秘书、主任参谋、情报参谋等职。

这次秘密军事会议，莫雄与

会。“铁桶计划”铁到什么程度？莫雄回忆：“这是我看到最阴险毒辣、规模巨大、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！若计划得以实施，红军处境不堪设想。”莫雄当晚即下山把这个绝密计划交给刘哑佛。项与年，情报被迅速送往中央苏区。中央红军赶在蒋介石“铁桶围剿”包围态势完成前，主动撤出中央苏区，开始了长征。

瓦解“闪击延安”计划

1937年，在组织建议下，熊向晖隐蔽党员身份，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，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“服务”。因其出色的文化素养和世家子弟风范，被胡宗南视为心腹爱将培养。董必武、周恩来便安排熊向晖以“闲棋冷子”姿态开始卧底。此后10余年，熊向晖深藏不露地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，为党中央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。

1943年，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处于紧急状态。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。熊向晖获悉后及时联系中共联络员王石坚，后者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密台将情报迅报延安。

7月4日，朱德明电胡宗南称：“……当此抗战艰虞之际，力谋团结，犹恐不及，若遂发动内战，必致兵连祸结，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，而使日寇坐收渔利，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，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。”将国民党的阴谋变阳谋，从舆论上置国民党于内外夹攻之势，保卫了党中央。

又一次保卫党中央

1947年，胡宗南再次按照蒋介石的部署，准备攻打延安。熊向晖暗中将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秘密呈交毛泽东、周恩来。

3月10日晚，胡宗南命部队于13日拂晓攻击前进。通过连日侦测，熊向晖部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，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，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。熊向晖深知这次较之1943年更为凶险，但他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，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，白纸黑字写在纸上、封入信

封，上写王石坚代名；另写一信给西安西大街“研究书店”潘裕然，请他勿拆附信，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专用信封。有了这份情报，党中央所有电台和无线电停止工作3天并撤出延安。同时，我军在延北全歼胡宗南精锐部队3个旅，所有旅长被俘，国民党“闪击延安”计划再次破产。

事后，毛泽东对西安隐蔽战线给予高度评价：“熊向晖，一人可顶几个师。”

勇破“穿心战术”

抗日战争时期，刘光国曾在北平日伪政府当办事员，在中共地下党影响下，有了朴素的革命理想，一心想参加革命。但党组织要求他回日伪政府去，从此刘光国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隐蔽战线工作。

1945年，刘光国奉命打入国民党孙连仲部队执行潜伏任务，多次获取敌人绝密文件、电报等提供给党中央。“泄密事件”不断发生，敌人察觉到“共产党就在身边”，发誓“一定要把潜伏的共谍挖出来”，接连两次在内部展开“大清查”“大搜捕”，刘光国沉着应对、化险为夷。

1948年秋，蒋介石与傅作义策划对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实行偷袭。国民党内部将行动代号为“穿心战术”。这份绝密情报被潜伏在华北“剿总”文印室的刘光国获悉。此时，离国民党行动只有3天。

刘光国记下作战计划后，与接头上司甘陵联系；甘陵派出秘密交通员刘之骥背熟情报要点，向聂荣臻汇报。中共领导确定了颇具传奇色彩的“台前幕后紧密配合，斗智斗勇，以假乱真，虚实并举”的反偷袭方案。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，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刊发3篇雄文，把敌人偷袭计划向全国广播。同时，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兵在望都、唐河两地构筑抗阻阵地。

10月30日晚，敌军先头部队进至唐河南岸，离石家庄100多公里。华野三纵星夜兼程，于10月31日凌晨赶到沙河，从正面挡住敌军。至此，情况全面转危为安。

来源：《解放日报》

晋察冀边区的《树叶训令》

1942年，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聂荣臻司令员曾签发过一道《树叶训令》，命令全区所有部队，将村庄周围15里以内的树叶，全部让给老百姓，部队到远离村庄的无人区采摘树叶充饥。

1942年春，日军为了把华北变为其发动的“大东亚圣战”的供给基地，自1941年秋季开始，先后出动7万兵力，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“扫荡”。不幸的是，当时又发生了旱灾，边区军民收成锐减，不仅老百姓没有粮吃，军队自己的给养也成问题。为了度过春荒，我军战士们每天出去采树叶，“一棵大树上的树叶够一个排的人吃上一天”。

当时，唐县和家庄村老百姓有900多人，部队200多人，加起来1000多人，老百姓和驻军都以采树叶为食。聂荣臻司令员得到消息后，为了不影军民关系，便下了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树叶的训令。据八路军老战士田顺心回忆，当年部队每天不仅要跑十几里的山路去摘树叶，而且山上的野果还不能摘，也留给老百姓。

这个关于“禁止采摘树叶”的训令以布告的形式贴到了村庄周围。布告贴出后，村民发现和我们一起摘树叶子的八路军指战员不见了，很是感动。老百姓纷纷表示，八路军是我们的子弟兵，大家应该一起共渡难关。更有一些群众找到军区和边区政府，见到了聂荣臻，恳切地希望他收回训令。军区和边区政府亲切接待了来访群众，但训令不仅没有被收回，而且还传达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其他部队贯彻落实。

为了共渡难关，晋察冀军区的机关、部队在严格执行训令的同时，制定了节约粮食计划，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每人每天要节约一至二两粮食。仅1942年，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，这批节省下来的粮食用于救济受灾的老百姓。机关和部队还迅速动员起来，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，军民团结一心，终于度过了这段最困难的时期。

来源：《人民政协报》